

錢文子生平與著述考

汪桂海

錢文子是生活在南宋孝宗至寧宗時期的一位著名學者，《宋元學案》稱“嘉定以後諸儒無一存者，文子巋然爲正學宗師”。足見他在當時的影響。但是，關於他的生平，《宋史》及其他史書中都沒有有一個較爲詳細的傳記，別的文獻中提到他時，也大多是三言兩語，而且查找極爲不易。他能够爲今人所知，大概主要是他撰著的一部流傳至今的《補漢兵志》的緣故，這本書是今天研究兩漢兵制者往往要提到的。除此之外，他的一些情況，恐怕瞭解的就不多了。

八年前，在吳榮曾先生的指導下，我以《補漢兵志》爲基礎，翻檢史書與出土資料，對兩漢兵制資料作過一次整理。當時，爲弄清作者錢文子的生平，曾查找典籍記載，做了一篇札記。事後便放在一邊，未作更深入的探討。今將舊文找出，補充以新見到的資料，試對錢氏生平與著述加以考證，希望於大家瞭解錢文子有所幫助。

一、生平事迹

錢文子，字文季，南宋温州樂清（今浙江樂清）人。據《宋元學案補遺》引《温州舊志》記載，錢文子原名宏，字文子，後以字行，更字文季。因此，文獻中提到他時，或曰錢宏，或曰錢文子，或曰錢文季，實際上是一個人。明人凌迪知不明於此，在所撰《萬姓統譜》卷二十七中即將“錢文季”、“錢文子”當作兩個不同的人予以收錄。今人編纂的《全宋詩》亦疏於考索，將錢宏、錢文子當作兩個不同的詩人而分別列條目，把一人的詩作分爲兩處。這都不正確。

錢文子的出生時間不清楚。他的生平活動最早只能追溯到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間。明清之際黃宗羲《宋元學案》卷六十一，錢文子小傳稱：

乾淳之際，永嘉（今浙江温州）諸儒林立，先生遍從之遊，而於徐忠文公宏父尤契。入太學，有盛名。

徐宏，字尹之，温州平陽（今浙江平陽）人，淳熙八年（1181）進士及第，治《禮記》。當時温州一帶名儒甚多，這爲錢文子求學益知提供了很好的外部條件。在這種環境的熏陶下，他遍訪諸儒，學識大增。日後入太學，有盛名，當與這個時期的遊學有很大關係。

《萬姓統譜》卷二十七記載：

錢文子，字文季，樂清人。篤學明經，爲儒林巨擘。入太學，月書季考，每占高等。紹熙壬子，以兩優釋褐，授職官。其後把麾持節，皆以循良、介特著稱。

《南宋館閣續錄》卷九亦稱：

錢文子，紹熙三年上舍釋褐出身，治《春秋》。

可見，錢文子在太學的學業的確是很優秀的。宋代選拔讀書人做官，除了通過科舉考試之外，還採用學校與科舉相結合的制度，在太學中實行三舍法，即分外舍、內舍與上舍。根據考試成績，外舍生優秀者陞內舍，內舍生優秀者陞上舍。上舍生之上等可以不經過殿試直接取旨授官，中等免省試，下等免解試。紹熙三年（壬子，1192），錢文子因為在太學的學習成績優異，屬於上舍生中的上等，未經殿試直接授以官職。據《兩朝綱目備要》，當時授錢文子的官職是宣教郎：

（宋寧宗慶元三年）六月癸卯，言者論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二三溫人，所謂狀元、省元、兩優釋褐，若非其私徒，即是其親故。望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時有宣教郎錢文子者，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回，當召試，徑就部，注潭州醴陵知縣而去，時人稱之。

宣教郎是從八品的京官，且祇是京官的寄祿官，非真正的職務。後來，衛涇舉薦錢文子的狀文中有一句“由幕僚改秩宰邑醴陵”的話，所說的幕僚，指的就是錢氏作宣教郎的這段經歷，因為宣教郎屬於幕職官。這條材料表明，錢文子直到慶元三年（1197）才陞作知縣。那麼，從紹熙三年至慶元三年，將近六年的時間，錢文子是怎樣度過的呢？通過一些記載知道，他此時大約一直在婺州等地活動，以課徒授業為主。《宋元學案補遺》“錢文子”條下：

梓材謹案：《東陽石洞遺芳》載，先生主石洞師席，又與諸葛千能並主郭氏高塘庵師席，講明洛學。後宰醴陵，因屬葉味道續主其教云。

東陽為婺州屬縣。錢文子是南宋理學的一個重要人物。根據這段記載得知，他在婺州呆了相當長的時期，先後於東陽石洞以及郭氏高塘庵等書院講受洛學。慶元二年（1196），錢文子來到婺州的治所金華縣。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八《與呂子約寺丞書》云：

錢文季寓金華縣，俟來春班注邑，可謂良圖。

這封書信寫於慶元二年十月。宋代，像宣教郎這樣不常參的京官，必須經過磨勘（考核）和一定員數舉主的推薦，根據本人有無出身，是否達到規定的考數（任職滿一年為一考），決定能否改為朝官。而改為朝官，初任者必須擔任知縣。如周必大《與呂子約寺丞書》中所說，錢文子到金華縣的目的，是等待期滿進京，希望經考核能除授一份實職。

錢文子離開金華縣，赴京接受考課、差遣，大約是在慶元二年年底。周必大《文忠集》卷四十一收錄一首詩，題為《錢文季狀元去春用楊吉州子直韻賦〈玉蕊詩〉，老悖久稽奉酬。今承秩滿還朝，就以爲餞》（丙辰）：

晝攬群芳博物華，夕披衆說聚螢車。花來北固無新唱，詩到西甌有故家。鄉里孝廉流澤遠，弟兄科甲縉紳夸。盍歸史館開群玉，徐步詞垣判五花。

從詩題及詩句來看，這首詩是周必大為錢文子送行所賦，作詩時間署曰丙辰，為慶元二年。時周必大已致仕歸里（廬陵，今江西吉安）近兩年，詩應是寄贈。前引周必大《與呂子約寺丞書》表明，慶元二年十月，錢文子還沒離開金華，則錢氏離開金華當晚

於十月。詩中充滿了對錢氏此行的美好祝願。首句“晝攬群芳博物華，夕披衆說聚螢車”，又讓我們瞭解到錢文子這幾年始終勤於讀書、著述，《補漢兵志》即撰於這一時期（詳見下文），估計他一生的大多數著作可能都完成於此時。另外，錢文子一生中祇有這一時期的主要活動是課授弟子學業，因此他的許多弟子門生應產生於此時。其弟子中不乏著名者，據《宋元學案》卷六十一所舉就有喬行簡、丁黼、曹鹵、湯尹會。另外，見於載籍者還有先後主持刊布《補漢兵志》的陳元粹、王大昌。

在動身赴京之前，錢文子還與退休江西吉水故里的楊萬里通過音信。誠齋先生對錢文子頗為推許，他的《送錢文季僉判詩》應為此時寄贈錢文子的：

東海珠胎清廟珍，璧水秀孝第一人。胡爲俯首蓮泛綠，如有用我試治民。古來幕中要婉畫，君乃不肯作此客。囊篋細碎吾不能，玉壺清冰朱絲直。梅花雪片迎新年，送君搏風上九天。風池鷄樹祇咫尺，致君堯舜更努力。

楊萬里生前曾將自己的詩作依照不同的生活、歷仕階段分別編為一集，每一集所收的詩亦大抵以作詩時間先後為序。此詩收於他的最後一部詩集《退休集》中。該詩集乃楊萬里紹熙三年辭卻江東副使退休故里之後的詩作。《送錢文季僉判》前面的詩中，有一首《丙辰歲朝行東園》，是慶元二年（丙辰）元日所作，直至這首《送錢文季僉判》，這一部分詩均應為該年之作。從這些詩的時間順序來看，作《送錢文季僉判》時已界臘月。此詩也有“梅花雪片迎新年”的句子。結合前文引錄周必大的贈詩，可以推定錢文子赴京是在慶元二年臘月。楊萬里的贈詩對錢文子也是贊賞有加，知錢文子有經世濟民之抱負，不肯久為低微的幕職官，希望能被朝廷重用，更希望他將來能致君為堯舜，建功立業。同周必大詩一樣，楊萬里對錢文子此後的前途頗為看好。但一面臨當時的朝政現實，這些美好的願望就受到了挑戰。

慶元年間，權相韓侂胄為打擊政敵趙汝愚、朱熹等人，推行黨禁。凡與韓意見不合者，均被稱為“道學”之人，斥道學為“偽學”，禁毀理學家的書籍。有關的人陸續被罷免、竄逐。正如前引《兩朝綱目備要》所反映的那樣，錢文子進京考核時，受到了這次政治事件的影響。他被差遣去任知縣的醴陵縣屬於潭州，地處僻壤，治安混亂，但他還是“徑直赴任”。到任之後，錢文子“不卑其官，刻意民事，撫摩善良，鋤治奸惡，盜賊為之屏息，豪杰望風斂戢，縣計上供之外，沛然有餘”（衛涇《後樂集》卷十一《應詔舉人才舉游九言、錢文子、黃宜狀》）。展示了他具有良好的治民理政能力，並非志大才疏之徒。

慶元黨禁直至嘉泰二年二月才有松弛。對這次政治事件及其發起者韓侂胄，史書中雖未留下錢文子的任何言論，實際上他是極為反感和不滿的。嘉泰元年（1201），呂祖泰詣登聞鼓院，上書直言，稱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結果，呂祖泰因此受到迫害，被杖貶，發配欽州。《宋史·呂祖謙傳》附《呂祖泰傳》記載說：“祖泰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為醴陵令，私贖其行。侂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郢間。”韓侂胄欲將耿直不阿的呂祖泰置於死地。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錢文子不顧功名利祿的得失，乃至身家性命之安危，不避人耳目，向發配途中的呂祖泰贈送盤纏。這件事情反映了他對韓侂胄擅權的強烈抗議，也表現出他的性格確實有耿介特立的一面。《萬姓統譜》說他“以介特著稱”，是符合事實的。

《〔嘉定〕赤城志》卷九記載，嘉泰四年（1204）十二月十二日，錢文子以朝奉郎知台州。至開禧元年（1205）四月十八日，他又改知常州。知常州時期的行實，缺乏記載。在台州不到半年的時間里，錢文子依然“振厲風采，治民馭軍，寬猛得宜。”（衛涇語）

台州有一處古迹曰梅臺，據稱是錢文子知台州時所修。《〔嘉定〕赤城志》卷五記載：“梅臺，在赤城奇觀前，開禧元年錢守文子建。下臨巨壑，有梅數十本焉。”赤城奇觀是一處亭榭，在郡圃後山上。

在台州，錢文子還經常與一些文人雅士相邀聚會，其中的一位為林憲，字景思，號雪巢，人稱雪巢先生。在他從台州任上離開時，雪巢先生已經病重不起，不久就去世了。錢文子為此作了一首悼亡詩《次韻李使君追悼雪巢先生》，詩後的自注說：“予為台州，雪巢屢從予飲池上，未幾，病不能起。比予罷官，別之牖下。”追述了在台州的這段交往。

嘉定元年（1208），錢文子再次調遷，入川充成都轉運判官（《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十四之三十二）。估計是到成都之後不久，他做了一件事，贏得了蜀人的尊重。原來，數年前權相韓侂胄為固位自重，發起“開禧北伐”。開禧二年（1206），四川宣撫副使吳曦叛變，向金稱臣割地。吳曦的叛降行徑，受到四川官員、將領的強烈抵制。開禧三年（1207）二月，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字子淵，蜀地益昌人）與四川宣撫副使司隨軍轉運使安丙、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合謀，誅殺吳曦。論功，應以巨源為第一。但賞不酬功，詔命一字不及巨源。接着，有人誣蔑楊巨源欲謀亂。是年六月，安丙派人殺害楊巨源。楊巨源之冤長時間未得申正，但蜀人深悉其情，感念他除曦之功，史稱“巨源之死，忠義之士為之扼腕，聞者流涕”（《宋史·楊巨源傳》）。錢文子嘉定元年到成都，正是巨源死後不久，得知其事，撰作祭文，吊念這位冤死的抗金功臣。這時距離朝廷為巨源雪冤還有七年。《萬姓統譜》卷二十七記載此事說：“錢文季，樂清人，為成都漕運判官。善屬文，義士楊巨源死於非命，文季為作哀詞，蜀人高之。”

在成都，錢文子呆了三年。對充任這份差使，他不很滿意。這一點從他作於此時的《望吳亭次黃二尹韻》詩可以看出來。詩云：

東望長安山復山，數峰還出兩峰間。攬衣來即三年戌，引客聊為一日閑。身似暮雲低更好，心如歸鳥倦知還。聖朝倘得收遺物，嘆息搔頭鬢已斑。（清曾唯《東甌詩存》卷四）

詩中借用漢唐之長安指代當時的京城臨安。臨安在成都之東，故曰“東望長安”。“攬衣來即三年戌”一句表明此詩作於錢文子擔任成都轉運判官的第三個年頭，即嘉定三年（1210）。錢文子與同時代的許多有志的士大夫一樣，本來是想有一番作為的。身為學者，他沒有鑽進書本裡不理睬現實，相反，他的一些著作如《補漢兵志》、《漢唐制度》等都是有感於現實政制中的弊端，希望從歷史上借鑒好的制度來加以改良而作的。他也希望自己的思想能使現實變得更好一些，國家擺脫內憂外患不斷的局面。但天不與時，南宋朝綱屢屢落入庸碌無能而又擅權敗政之人手中。前有韓侂胄攬權，迫害廷臣。此時朝內又值權臣史彌遠當政，對外敵一味屈服妥協，對內則排斥異己，招權納賄，賄賂公行，廷臣中的正直人士，如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夢星等皆遭貶逐。在這種

情況下，像錢文子這樣真正有憂國之心的人，是得不到重用的。詩中自稱為“朝廷遺物”，蓋緣於此。錢文子這時年事已高，鬢髮都斑白了。他對仕途生活也開始產生厭倦，發出“身似暮雲低更好，心如歸鳥倦知還”的感嘆，這應該是他日後致仕歸隱的原因。

這期間，魏了翁受史彌遠的排斥打擊，也被貶逐至蜀，知漢州。漢州屬成都府路，錢、魏二人得以時常相見，他們講學論道，引為知己。魏了翁《鶴山集》卷一百零八《師友雅言上》記載了他們二人與李仲衍、楊嗣勛等曾經有過的一次聚會，聚會上，他們一起講論學問。又同書卷五十四《錢氏詩集傳序》提到：“始公奉使成都，嘗出以示予。”說明錢文子在任成都轉運判官時，曾向魏了翁出示過所撰《詩集傳》（即《白石詩傳》）。

此外，錢文子還結識了蜀地的一些學者，史容即為其中一位。史容，字公儀，號薌室居士、青衣人。仕至太中大夫。晚年謝事，著書不休，所撰《山谷外集詩注》為藝林所寶，流傳至今。錢文子任職於成都的時候，史容年已七十餘，此書大約完成不久，準備付梓，先由其子史叔廉呈與錢文子。錢文子遍閱此書，大為贊賞，為之作序。時在嘉定元年十二月乙酉。

嘉定三年（1210）九月，錢文子結束地方官生涯，入朝為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及實錄院檢討官。嘉定四年（1211）四月，遷調宗正少卿，仍兼國史院編修官及實錄院檢討官。宗正少卿掌修纂宗室譜系屬籍，國史院編修官與實錄院檢討官負責撰寫本朝正史與實錄。錢文子雖得入朝為官，然所授均非要職，無從施展平生抱負。數年後，錢文子即辭職退隱。嘉定七年（1214），陳元粹序《補漢兵志》說：“先生乃老矣，方力疾句休，築室深山中，徜徉物外，以書史泉石自娛，將終身焉。”可見，這一年錢文子決意致仕退隱了。

樂清縣有白石山，山有白石岩。錢文子退隱後居白石山下，因以為號，自稱白石山人。他有一首《白頭岩》詩，即咏此白石岩的：

岩下碧藤挂紫烟，岩頭白石插青天。精靈屹作鄉邦鎮，一劍寒霜二百年。
此詩收於清曾唯《東甌詩存》卷四，《全宋詩》收在“錢宏”條下。作詩的時間估計是在錢文子退隱之後。我們從這首詩依然可以感受得到退隱之後的錢文子胸中不了的豪情壯志，可惜祇能形諸詩文，讓後人品味了。

錢文子在退隱後仍保持與師友之間的書信往來，時有酬答。韓泂《澗泉集》卷十二《寄錢文季卿》當是此時期韓泂寄贈錢文子的詩作。

錢文子去世於何時？紹定六年（1233）喬行簡序《白石詩傳》稱，錢文子“沒，今二十餘年”。上推二十年，正當嘉定七年（1214）。或許他在退隱之後不久即去世了。

二、著述考

如前文所說，錢文子勤於著述，其詩文著作數量應當比較可觀。但他的許多著作已經佚逸，祇在古人的書目中留下書名。詩文則祇有少數幾篇散見於不同的書籍里，需要費工夫搜檢。

現在，先說一下他的著作：

1. 《白石詩傳》二十卷，見《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又《文淵閣書目》卷一“地字號第二櫥書目”詩類，有“詩錢文子傳，一部，十一冊。詩錢文子傳，一部，四冊。”亦為此書。

《詩經》作為儒家經典之一，在漢代已有今、古文之分。今文詩凡三家，即齊、魯、韓。古文詩則僅毛氏一家。漢末鄭玄混合今古文家法，本《毛傳》，雜採三家，撰《詩箋》。自後，今文《詩》漸次亡佚，惟古文派之《毛傳》及鄭《箋》占據統治地位。至宋代，人們開始對前人的《詩經》學大膽懷疑，辨正其失。歐陽修、蘇轍、鄭樵、程顥等相與“辨序文，正古音，破改字之謬，辟專門之隘”。朱熹集其大成，有《詩集傳》傳世。錢文子的《詩傳》就是在這種學術思潮的影響下的產物。

此書現已亡佚，但魏了翁、喬行簡先後所作序文還能找到（並見朱彝尊《經義考》，魏序又收於《鶴山集》）。根據他們的序文，《白石詩傳》的基本內容尚可推知一二：其一、宋人認為《詩》序有古序、續序之分，每篇首二語為古序，其下學者增益之辭則為續序，亦曰後序。蘇轍《詩集傳》始認為毛序不可盡信，存其古序，刪去續序。錢文子《詩傳》對毛序亦僅存序首之語，而去所謂後師增益之說。其二、喬行簡序中稱此書“一章之中釋以數語”，是說《詩傳》對《詩》的字句作了注解、訓釋。清顧鎮《虞東學詩》卷十二《殷武》下引用了錢文子《詩集傳》的一段注釋，引文如下：

《集傳》錢文子曰：“圓，直也。‘是斷是遷’，言截之所生之地，徙之造作之處也。方，正以繩墨也。斫，削以斧斤也。”

《白石詩傳》又稱錢氏《詩集傳》，《虞東學詩》引作《集傳》，乃簡稱。這段引文是對《詩經·殷武》“是斷是遷，方斫是虔”一句作的注釋。藉此可以知道錢氏《詩傳》在這一方面所作的工作大概。其三、喬行簡序又稱此書“一篇之後贊以數語”。魏序也說此書“約文述指，篇為一贊。凡舊說之涉乎矜己訕上、傷俗害倫者，皆在所不取”。案，《詩經》中有不少譏諷君主、批評現實的詩，還有不少愛情詩，這些詩都是當時人生活的真實反映，但《毛詩》序因道德說教和意識形態的需要，把這些詩神聖化，塗上政治色彩，扭曲詩文真實含義，成為封建道德說教的作品、教材。宋人對詩序敢於大膽懷疑，例如朱熹就揭其面紗，指出許多詩皆淫亂之詩，這是宋人的一個功勞，但他們作為理學家，又以道學的眼光來評判《詩經》中的愛情詩，冠以“淫亂”二字，甚或主張把這類詩從《詩經》中剔除掉。錢文子作為理學家，也跳不出時代給他的局限，他的《詩傳》“約文述指”為每首詩作贊，無疑是用理學家的標準來評判詩篇，所以對“舊說之涉乎矜己訕上、傷俗害倫者”，都予以批判、拋棄。

對錢文子《詩傳》的價值，清人顧鎮有過一個評價，可作參考。他說：

古今詩說最繁，錢氏（明錢天錫）《〈詩牘〉序》所載有書可考者一百一十八部，其見於《漢志》、《隋志》、《唐志》、宋《三朝志》、《四朝志》、《中興志》不可更僕數，而其中卓然可傳者，推歐、蘇、呂、嚴四家，而王景文之《總聞》、錢文子之《詩傳》、曹粹中之《詩說》、陳少南、李迂仲之《詩解》，亦如驂有靳。（《虞東學詩·例言》）

錢文子《詩傳》最早是由其弟子丁黼爲之刊行的。刊行前，丁黼書請魏了翁作序。魏了翁在回復丁黼的書信中說：

錢白石《詩傳》，曩在成都，蒙渠出示，草草看得數篇，全不能記。今欲作序文，須是見得大意，方可著語，似難臆料。（《鶴山集》卷三十五《答丁大監》）鶴山先生後來爲此書作了一篇序文，在序中也說：

始公奉使成都，嘗出以示予。至是，門人丁文伯黼起家守廬陵，將爲板行，而屬予題辭。（《鶴山集》卷五十四《錢氏詩集傳序》）

根據魏了翁的這兩段話，錢文子的《詩傳》成書的最後時間不晚於他爲成都轉運判官時。書的刊行是在丁黼“起家守廬陵”即知吉州（廬陵爲吉州治所）之時。丁黼知吉州的時間未見記載。《鶴山集》中收魏了翁與丁黼書信有兩件，另外一件收於卷三十七，標題稱丁黼爲“丁制副”，時間署作“甲午”（端平元年），這年丁黼出任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大致可以認定，《鶴山集》所擬定書信標題對丁黼官職的稱呼與當時的實際情況基本吻合。《答丁大監》稱丁黼曰丁大監，是因爲丁氏曾以朝請大夫爲軍器監寶慶元年（1225），魏了翁應丁黼之請爲其父撰墓誌銘中提到丁黼當時的官職即軍器監（見《鶴山集》卷八十一《贈奉直大夫丁公墓誌銘》）。《錢氏詩集傳序》又稱丁黼“起家守廬陵”。據此推測，魏氏作序之時，或說此書刊行之時，丁黼恰好由軍器監調爲知吉州。《〔雍正〕廣西通志》卷五十一記載，丁黼於紹定四年（1231）以中奉大夫直敷文閣任靜江府知府。丁黼知吉州似應在此之前。以此，可大致劃定錢文子《詩傳》的首次刊行是在寶慶元年之後、紹定四年之前。若干年後，即紹定六年（1233），錢文子的另一位弟子喬行簡囑托司馬光之孫司馬述重刻於永嘉郡齋，時司馬述正出守永嘉（即溫州）。這兩個刻本應是《白石詩傳》的最早刻本。清初，朱彝尊作《經義考》時，此書尚有刻本存世。今日則難以尋覓。

2. 《詩訓詁》三卷，《宋史·藝文志》有著錄。

從魏了翁、喬行簡序《白石詩傳》看，丁黼、喬行簡刊刻《詩傳》時，是將《詩訓詁》也一同刊行的。《詩訓詁》共分一十九門，即釋天、釋地、釋山、釋水、釋人、釋言、釋禮、釋樂、釋宮、釋器、釋車、釋服、釋食、釋禽、釋獸、釋蟲、釋魚、釋草、釋木（《經義考》卷一百五引徐秉義說）。仿照的是《爾雅》將詞匯分類訓解的體例。魏序說《詩訓詁》“如《爾雅》類例”是符合事實的。明馮復京《六家詩名物疏》所列舉的引用書目中，有錢文子的《詩詁》。朱彝尊作《經義考》時，標注此書尚有刻本存世。現已亡佚。

3. 《中庸集傳》一卷，《宋史·藝文志》、明朱陸樸《授經圖義例》有著錄。

《論語傳贊》二十卷，《宋史·藝文志》有著錄。

《孟子傳贊》十四卷，《宋史·藝文志》有著錄。

此三書於朱彝尊作《經義考》時，均已亡佚。其內容估計主要也是借經書闡發作者的理學思想。

4. 《漢唐制度》，明《文淵閣書目》卷一“黃字號第三櫥書目”收錄有“錢文子《漢唐制度》一部，一冊。”王應麟《玉海》卷四十九《藝文》著錄錢文子《漢唐事要》二十卷，不知是否爲同一書。

宋代人編《群書會元截江網》收錄兩條錢文子論述評議漢代“上計”與“役法”的文字（分別見卷九“會財”、卷二十“役法”），其中關於漢代上計制度的論述，在引文末注明出自《制度論》，另一條雖未注明出處，據其論述特點分析，也應該是根據《制度論》。而且，從兩段文字的內容來看，《制度論》即《漢唐制度》一書。這部書大約主要論述漢唐實行過的典章制度，評議其得失，間與宋制比較，目的似是試圖從歷史上施行過的典制中汲取有用的部分，藉以革除宋制之弊端。

5. 《補漢兵志》一卷，《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玉海》、《宋史·藝文志》均有著錄。惟《解題》與《通考》“志”作“制”，前人早已指出屬於訛誤（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正史之有“兵志”始於歐陽修、宋祁等編修的《新唐書》，此前正史均無“兵志”，《史記》、《漢書》、《後漢書》也不例外，這為後人研究漢代兵制造成了不少困難。因為沒有系統的記載保存下來，後人祇能從史書中去搜稽散見的材料，排比歸納，最大限度地揭示兩漢兵制的面貌。錢文子的《補漢兵志》正是這樣的一部補闕之作。陳元粹序云：“蓋漢兵最近古，其規模尤精密，而史闕其文，姑採摭群書，先志其大節，而其纖悉未能盡載此書也。”清朱彝尊跋亦稱，錢文子見“漢制不失寓兵於農遺意，而班史無志，因以補之”。

但是，補漢史“兵志”之闕並非錢文子作《補漢兵志》的初衷，換句話說，他不是專為補闕而作《補漢兵志》的。補闕祇是動機的一個方面，更主要的是為了總結漢代兵制的得失，向朝廷提供一些改良宋代兵制的參考意見。

宋初懲五代之弊，收天下精兵萃聚京師。當時兵聚尚精，久則兵聚而不可復用，冗兵冗費成為有宋一代難以解決的一大痼疾。遲至南宋，愈益甚焉。有識之士多以改良兵制為急務，他們開始總結歷史上的兵制，希望能從中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漢代早期也曾面臨來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嚴重侵擾，但漢代最終將北方的匈奴勢力打敗了，不像宋朝飽受遼金的侵略威脅。因此，宋人對漢代的兵制尤為注目。當時，與錢文子《補漢兵志》類似的著作頗有一些，如《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二著錄“《兩漢兵制》一卷，建安王珣器之撰。《漢兵編》二卷《辨疑》一卷，姑蘇潘夢旂天錫撰。”《宋史·藝文志》著錄有陳傅良《漢兵制》一卷，徐天麟《漢兵本末》一卷。這些著作均是為宋事立議，非單純就漢兵制論漢兵制。可見，錢文子《補漢兵志》的編著，是南宋學術界一股思潮的反映。

《補漢兵志》撰寫於何時？據錢文子的弟子陳元粹序云：“《漢兵志》，永嘉白石先生往為大都授時所著。”案，“大都授”，語出《漢書·翟方進傳》，翟方進與胡常皆習《春秋》經，而名出其上，但方進尊讓胡常，“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顏師古注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錢文子為大都授是在紹熙三年（1192）至慶元三年（1197）之間，這一時期他先後主持過東陽石洞與郭氏高塘庵等處師席，課授弟子，講明洛學。因此，《補漢兵志》成書應在這一時期，下限不晚於慶元三年。

《補漢兵志》成書以後，初時大約祇是在弟子之間傳閱。陳元粹序即稱：“予少小執經師從，曾備討閱。”錢文子的另一位弟子王大昌也說：“余曩從先生游，得見此書，

即手抄爲家藏，且以訓族里，思與好學之士共之。”說明最初是以抄本流傳。其有刊本，始於陳元粹。嘉定甲戌（七年，1214），時官奉議郎、知江州瑞昌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買納茶場的陳元粹，在瑞昌縣署主持刊刻了這部書。在書前，陳元粹作了一篇序文，敘述此書的原委，另外，他還加了一篇《補漢兵志綱目》。次年五月，官奉議郎、權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的王大昌從陳元粹那里得到了這個刻本，很是興奮，寫了一篇跋，並於同年九月以陳元粹刻本爲底本，鋟板於漕廩，以使此書流傳更廣。這是《補漢兵志》最早的兩個刻本，也是直至清初以前僅有的兩個刻本。

元明兩代流傳的主要是以王大昌刻本爲底本的抄本。現在所知的有如下幾種：

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九政書類著錄：

《補漢兵志》一卷 舊抄本 玉蘭堂藏書

宋白石先生錢氏文子撰

玉蘭堂、毛子晉、季滄葦、席玉照、楊繼梁俱有印記，題簽尚是子晉手筆，可貴也。

陳元粹序 嘉定甲戌

王大昌跋 嘉定乙亥

玉蘭堂是明代著名藏書家文徵明的藏書處，其藏書印有“玉蘭堂”，玉蘭堂抄本很有名。這個抄本中抄有王大昌跋，說明其所據底本是王大昌刻本。此書從文徵明那裡，經毛晉、季振宜、席鑒、楊繼梁，傳至張金吾手中，可以說迭經名人呵護。後來流往何方，則不得而知。

清初錢曾的藏書中也有一部《補漢兵志》，見《也是園書目》“史部·故事”，估計也是明代的抄本。需要說明的是，《也是園書目》把《補漢兵志》的作者錯誤地著錄爲“姜白石”。宋代以白石爲號者不止姜夔一人，錢文子、黃景說亦皆號白石，且三人皆以所居爲號（參見《愛日齋叢鈔》卷二）。錢曾大約以爲惟姜夔號白石，見書署曰白石先生，又未翻看書文，遂解作“姜白石”。後來，朱彝尊借錢曾藏本過錄了一個抄本，在跋中提到錢文子的《詩傳》與《補漢兵志》“皆以白石著錄，不知者疑是姜夔書，誤矣”。蓋暗指錢曾。錢曾所藏的這個抄本，後來也不知去向。

國家圖書館收藏有《補漢兵志》的另一個明抄本，也是據王大昌刻本摹寫的，半葉七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同，無格。書有缺葉。上有“（葉）樹廉”、“石君”、“孫印從添”、“慶增氏”等印，可知其流傳情況。此抄本原爲瞿氏鐵琴銅劍樓收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二“史部·政書類”有著錄，云爲“影抄宋本”。

清代，此書依然有不少抄本流傳。國家圖書館藏有兩個清抄本：一爲清張位抄本，有“張位”印。此本似據葉樹廉藏明抄本影抄，兩個本子的行款相同，缺葉和宋諱缺筆也相同。另一抄本在逸野堂藏本史類第三冊，半葉十一行二十一字，無格。有“靈溪精舍藏書之印”、“周子校”、“柯逢時印”等印記，原爲柯逢時藏書。

清初，朱彝尊以也是園藏本爲底本過錄的本子，後來依次經過盛百二、吳江沈氏收藏，再後來，爲鮑廷博所得。

清沈德壽抱經樓藏書中有一個抄本。據《抱經樓藏書志》卷二十九“政書類”：

《補漢兵志》一卷 舊抄本

宋白石先生錢氏文子撰

陳元粹序 嘉定甲戌

王大昌跋 嘉定乙亥

(抄錄朱彝尊跋)

(抄錄鮑廷博跋)

不知這個本子是朱彝尊抄本，抑或是據鮑廷博刻本所抄錄的又一個抄本。

另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政書·軍政”，天津圖書館、湖南省圖書館、安徽省圖書館各藏有一部該書的清抄本，安徽省圖書館藏的清抄本有李文藻跋。

現在，人們常見的《補漢兵志》多是《叢書集成初編》本和《二十五史補編》本，這兩個本子較易找到。它們事實上都是據鮑廷博刻《知不足齋叢書》本排印的。鮑廷博以重值自吳江沈氏購得朱彝尊抄本後，對書中的文字詳加校讎比勘，正訛補闕，收入《知不足齋叢書》，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月鋟梓家塾，再廣其傳。

其實，在鮑廷博刻本之前，還有一個乾隆三十四年（1769）般陽書院刻本。此本在國家圖書館與杭州大學圖書館都有收藏，杭大藏本有清末孫詒讓手校記。這個刻本的底本也是朱彝尊抄本。通過書後面盛百二跋，知朱彝尊抄本曾被盛百二購得，時間估計應先於吳江沈氏。盛百二晚年居齊魯間，主講山棗、棗城等書院十數年，乾隆三十四年前後，大約正主般陽書院師席，故於般陽書院開雕。付雕之前，先後經過了益都李南澗、淄川高本欣的校勘。

在鮑廷博刻本之後，有清嘉慶年間桐華館刻本，即清金德輿編《桐華館史翼》第一冊。此書國圖有藏。

鮑廷博校刻《補漢兵志》，對該書的流傳是有功勞的，不過，關於該書作者是誰，他卻有些誤解。他在跋中認為書雖是錢文子撰寫，其中的注則是錢氏門人陳元粹補加的。這一說法沒有根據。

首先，若注文確為陳元粹所作，則陳元粹在書中不能不有所透露。陳氏刊刻該書時，在書前加了一篇《補漢兵志綱目》，他就特別說明這是自己所作，不是原書所有，他說：“元書初不立此綱目，予慮學者未明，復表出之，非本旨也。元粹謹書。”對一篇文字不多的《綱目》尚且如此，那麼，占全書絕大部分篇幅的注文若屬於陳氏手加，陳氏必無不作絲毫聲明的道理。

其次，王大昌也見過《補漢兵志》原稿，並且抄錄了一份，因此，錢文子《補漢兵志》本來的內容結構他是熟悉的。陳元粹刻的《補漢兵志》他很快見到了，若那些大量的注文非原書所有，王大昌一看即知，他在自己主持刊刻該書時所撰寫的跋裡，必然會有所透露。而我們從他的跋裡看不見片言隻語談到這一點，此正可作為注文非陳元粹補加之證據。

再次，歷來著錄《補漢兵志》的目錄書，如《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愛日精廬藏書志》、《抱經樓藏書志》等，一直認為此書為錢文子所撰。若《四庫全書總目》則明言錢氏“摭其本紀列傳及諸志之中載及兵制者，裒而編之，附以考證論斷，以成此書”。周中孚《鄭堂讀書記》也說：“俱採摭《漢書》中載及兵制者，列為大綱，而傳益以他書，為之考證論斷，以附其下。”都認為書中列舉本紀、

列傳及諸志裡的材料作的注，是錢文子撰寫的。

可見，鮑廷博以注爲陳元粹所作，屬於臆測之辭。

除了上述著作外，錢文子應該有不少單篇詩文。因爲他本人及後人從未進行搜集整理，編成詩文集，這些零散的詩文也就大都亡佚了。現在能找到的已經寥寥無幾，有的還是祇存篇名。

1. 《維摩庵記》

撰寫時間不明。今存。真德秀《跋錢文季少卿〈維摩庵記〉》（《西山文集》卷三十四）與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二十均提到並引錄了這篇文章。

2. 《〈山谷外集詩注〉序》

今存。此序文乃錢文子爲成都轉運判官時，於嘉定元年十二月乙酉爲史容撰寫的《山谷外集詩注》而作。附見該書。

3. 《〈史韻〉序》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五上：“《史韻》四十九卷，回溪錢諷正初所編也。依唐韻分四聲，而以十七史之句注於下。諷，錢塘人。鄭僑、錢文子爲之序。”此序文已佚。

4. 《祭周必大文》

嘉泰四年（1204），周必大去世。錢文子爲作祭文。今存，見周必大《文忠集》附錄一《祭文》。

5. 《祭楊巨源文》

錢文子爲成都轉運判官時撰寫。詳見前文。今不存。

6. 《次韻李使君追悼雪巢先生》

見《宋詩紀事補遺》卷五十九，《全宋詩》收錄。創作時間應在開禧元年四月錢文子改知常州之後不久。參見前文。

7. 《望吳亭次黃二尹韻》

見《東甌詩存》卷四，《全宋詩》收錄。創作時間在嘉定三年錢文子未離開成都之時。參見前文。

8. 《白頭岩》

見《東甌詩存》卷四，《全宋詩》收錄。創作時間應在嘉定七年錢文子退隱之後。參見前文。

9. 《宸尊絕句》

見《永樂大典》卷三五八四引《壽昌乘》，《全宋詩》收錄。關於此詩的創作時間，需要多說幾句。原詩如下：

招邀風月須坡叟，管領江山屬漫郎。更築危亭依巨石，願從二子老滄浪。

案：坡叟指蘇軾。蘇軾謫官黃州時，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漫郎爲唐人對元結的稱呼。唐顏真卿《顏魯公集》卷五《元次山表墓碑銘序》記載元結“將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及爲郎，時人以浪者漫爲官乎，遂見呼爲漫郎。”此詩詠宸尊而又同時提到元結與蘇軾，則此宸尊當與二人有某種關係。根據《永樂大典》卷三五八四輯錄的有關

窠尊（或曰窠樽）的典故，古之窠尊有四處，一在郴州（今湖南郴州市），一在道州（今湖南道縣），一在武昌之石門山，一在武昌之郎亭山。郎亭山之窠尊原稱杯窠尊，稱窠尊乃後人之說。這四處窠尊，與元結有關係的為兩處，分別在道州和武昌之郎亭山，於道州之窠尊，元結撰《窠樽銘》與《窠樽詩》，於武昌郎亭山之窠尊，元結撰《杯樽銘》。蘇軾謫官黃州，游武昌，曾到郎亭山游覽，見過後一窠尊。因此，錢文子詩所說的窠尊當是武昌郎亭山之窠尊。

錢文子何時到過武昌郎亭山呢？元楊翮《雪堂思賢寺記》（見《佩玉齋類稿》卷一）有這樣一段記載，可供參考：

齊安浮屠之定惠院，為舊宋元豐中蘇文忠公子瞻謫是邦嘗寓焉，僧顯師因辟嘯軒以延之。公去益久，竟用丘墟。嘉定三年，吏部郎中錢文子始創雪堂院於東坡下，命學佛者文可守之，奉公祠。事緣定惠也。初，公之在齊安時，其故人為請於郡，遂得以故營地餘百畝畀公，是為東坡。公乃築雪堂，以居而躬耕其地。及吏部之創院，則合東坡之地盡有之。又買田為畝之百者五，以食其徒。明年，請額於朝，敕以為思賢禪院，而仍冠雪堂之號。

齊安、東坡均為地名，在湖北黃岡縣。這段記載告訴我們，錢文子曾於嘉定三年以吏部郎中之職在黃州呆了一段時間，應是結束了成都轉運判官一職之後。在黃州時，他創建了思賢禪院。黃州距離武昌甚近，蘇軾貶官黃州時，去過武昌郎亭山，游覽窠尊。錢文子之游覽郎亭山，吟詠窠尊，無疑應是在黃州這一時期，時間大約在嘉定三年至嘉定四年之間。如此，《窠尊絕句》的創作時間就約略可知了。

10. 《玉蕊詩》

前文說過，慶元二年（1196），周必大贈詩錢文子，題曰《錢文季狀元去春用楊吉州子直韻賦〈玉蕊詩〉，老悖久稽奉酬。今承秩滿還朝，就以為餞》（丙辰）。這表明慶元元年（1195）春天，錢文子作了一首《玉蕊詩》。此詩今佚。

11. “蜀中織成山，谷書廬山高。”

這是錢文子為樓鑰祝壽詩中僅存的一句，《全宋詩》漏收。根據樓鑰《攻媿集》卷五《錢文季少卿以“蜀中織成山，谷書廬山高”為壽，次韻》一詩，知道該詩是為祝樓鑰七十大壽而作。樓鑰生於紹興七年（1137），七十大壽當在開禧二年（1206），是為此詩句的創作時間。

《全宋詩》於“錢文子”條下，據《永樂大典》輯錄了一首題《狀元去春用楊吉州子直韻賦〈玉蕊詩〉，老悖久稽奉酬。今承秩滿還朝，就以為餞》的詩。事實上，這首詩并非錢文子之作，詩題也被弄錯了。如前文所引錄，這是周必大的作品，《全宋詩》“周必大”條下已經收錄。祇因為該詩題開頭為“錢文季”三字，輯錄者一時失查，誤以為乃錢氏佚詩而予以收錄。應予刪除。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初稿

二〇〇二年七月重新改寫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善本組）